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丛书

丛书主编 ◎ 马 达

当代中国乐理与 视唱练耳课程文化 与教学思想

主编 / 陈雅先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3J740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丛书

丛书主编 ◎ 马 达

当代中国乐理与 视唱练耳课程文化 与教学思想

主编 / 陈雅先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文化与教学思想 /
陈雅先主编. —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80751-805-1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基本乐理—教学研究—
中国②视唱练耳—教学研究—中国 IV. ①J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5817 号

书名: 当代中国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文化与教学思想
主编: 陈雅先

出品人: 费维耀
责任编辑: 杨海虹 解华佳 (见习编辑)
封面设计: 宫超
印务总监: 李霄云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www.shwenyi.com
上海音乐出版社网址: www.smph.cn
上海音乐出版社论坛: BBS.smph.cn
上海音乐出版社电子信箱: editor_book@smph.cn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4 谱、文: 252 面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978-7-80751-805-1/J·740
定价: 50.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21) 64315066 印装质量热线: (021) 64310542
反盗版热线: (021) 64734302 (021) 64375066-241

内容简介:

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具有理论与技能兼具的特点,为音乐艺术表演、审美、教育教学活动打下坚实基础,是音乐教育理念实施的主渠道。自近代西洋乐理输入中国,我国基本乐科教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就一直是一个不断吸收与融合的过程,而高校基本乐科教学体系也在学习借鉴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教学思想。

本书呈示了我国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文化与教学思想研究的新成果,是该领域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基本乐科发展的总体回顾和基本总结。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文化与教学思想的研究,对实施素质教育、推进音乐教育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书可供音乐教育研究者参考,也可作为音乐教育方向及乐理与视唱练耳方向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陈雅先,广州大学音乐舞蹈教育研究所所长,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高师乐理与视唱练耳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主干课程〈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编制组组长,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标志性成果《视唱练耳教学论》为国内第一部基本乐科学科方法论专著,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教科书《乐理与视唱练耳》(第一、二册)是国家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主干课程《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的指定推荐教材。

绪 言

当代中国基本乐科领域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及其述评

陈雅先

乐理与视唱练耳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课程,通常称为基本乐科。基本乐科兼具音乐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学科特点,为音乐艺术表演、审美、教育教学活动打下坚实基础,是音乐教育的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在学校音乐课程体系中具有奠基辐射的教育教学功能,是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新成果的实践主渠道。近年来中国基本乐科领域学术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者们不断转换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2010年9月17日,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主办的“全国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乐理与视唱练耳’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高师乐理与视唱练耳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广州大学成功召开。此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高师乐理与视唱练耳学术委员会,来自全国52所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基本乐科的一线教师、音乐研究所、音乐刊物杂志社、音乐出版社等单位的115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高师基本乐科发展的一个总体回顾和基本总结。

自近代西洋乐理输入中国,基本乐科教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就一直是一个不断吸收与融合的过程。在西洋乐理基础上建立的乐理与视唱练耳教学,曾面临过技术至上、忽视本民族音乐文化传统、中西二元对立等倾向。近年来,以音乐文化多样性的讨论为切入点,在如何形成具有中国音乐文化特征的基本乐科课程文化,建立兼具中华传统与现代理念的基本乐科教学思想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王耀华的《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与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改

革》基于音乐文化的多样属性,对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及教学中的文化多样性提出思考。该文提出在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教学中应以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如调式、旋法、节奏、结构、织体等多方面的音乐语言特点为立足点,进而理解多民族音乐文化语言,而不应以西洋乐理为依据来理解中国民族音乐语言。蔡梦的《简论高师基本乐理教学与音乐文化传承的关系》围绕和声音程“协和性”与多声部音乐、“泛音”现象与和弦排列、十二平均律与二十四个大调等三对范畴,论述了“高师基本乐理教学与人类音乐文化传承”的关系,认为音乐教科书中的一些既成规范和理论归纳,大多都鲜活地存在于音乐文化的传承中,乐理与视唱练耳教学应让学生学习一门活在音乐中的技艺。施咏的《乐理教学中的多元文化传承——以民族调式教学中的三个问题为例》通过民族调式教学中“调式分析中宫音缺失,即宫角大三度技术指标的失效后,调式如何判断?”“转调中中国民族调式与欧洲大小调式跨文化的互转现象”“什么叫五声音阶?五声调式是中国独有的吗?”的三个具体问题的提出及解答,探讨乐理教学如何从技术层面走向多元文化观照。文中提出,当代中国的乐理教学应该首先立足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传统,进而打破中西二元对立,加快与世界优秀音乐文化的融合进程,形成多元共存的开放性格局。张业茂的《符号学视野下的视唱教学》从符号学的视角反思视唱教学中乐谱作为“认知符号”和“审美符号”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为正确理解视唱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进而提升视唱效率、提高视唱教学质量提供了理论参考。该文从符号学的视角阐释了视唱练耳教学的目的,即培养学生熟练掌握各种乐谱符号,并正确理解这些符号在一首音乐作品中的“意指方式”,然后准确地再现音乐的“音响”与音乐的“情感或意义”。

自从音乐教育成为一门系统的教育学科以来,音乐哲学家和教育家们一直在试图回答“什么是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目的?”以及“怎样的音乐教育才能满足不断变化与发展的社会需求?”基本乐科的价值重估以及学科重新定位成为基本乐科教学思想研究的重要任务。以基本乐科教学目标的转变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单一注重“音乐的技术性”到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相结合”,再到本世纪初提出的将“理解音乐风格形成的因素,培养多元音乐文化认同感,了解与本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音乐历史与文化知识”的课程目标。不难发现,基本乐科课程的价值重估成为基本乐科课程定性、定位、定质的依据和前提,引领着课程的教学过程、教学评价,以及教材教法等的变革和创新。孟凡玉的《除了技

术还有什么?——视唱练耳文化属性谈》提出,视唱练耳学习具有极强的技术性特点,因而,它的技术因素受到高度的重视。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对视唱练耳教学其他属性的严重忽视。该文论证了在视唱练耳学习过程中,哲学观念会通过具体的作品渗透到学习者的心灵深处。因此,视唱练耳教学在使学生具备较为完善的音乐知识系统、音乐能力结构和音乐文化修养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陈雅先的《乐理与视唱练耳“分”“合”科问题:实质、利弊、路向》认为,对于乐理与视唱练耳“分”或“合”科教学问题,不能简单化地视为是教学的策略选择,其实质是学科中心主义、应试主义、二元对立定势思维的现实表现。该文认为,应关注讨论问题的立足点,是否建立在构建全面发展的“人”的课程价值上。黄琼瑶的《在变化中发展的高师基本乐科——以高师教改课程〈乐理与视唱练耳〉的教学为例》以音乐教育的行辨哲学为指导,从高师基本乐科教改的感悟与思考等三个方面对变化中的高师音乐基础课程进行研究。该文认为,《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将《基本乐理》与《视唱练耳》融合为一体,是顺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最典型的基本乐科课程教学研究案例,体现了充分促进综合音乐素质全面发展的课程价值。这些论文均对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的文化价值及教育价值进行了思考,为基本乐科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转换观念,从不同视角对基本乐科课程给予重新认识和价值重估。

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了音乐创作、音乐教学乃至音乐传播方式的变革。随着“数字化”手段越来越多地运用于音乐教学,相关的科研成果也不断问世。赵易山的《基本乐科——通过技术完成审美的关键》,强调了赋予音乐技术以情感意义的重要性。其团队研发的“有声基本乐科听力教材”,充分体现了将现代理念与技术运用于基本乐科教学实践的完美结合,颠覆了传统纸质教材的教学形式,形成了系统化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许新华的《基于网络状态下的〈视唱练耳〉教学》,刘国辉的《多媒体系统在高师视唱练耳课程教学中的运用》将多媒体电脑、投影仪等“数字化”教学手段运用于音乐课堂教学,探讨了音乐技能性课程如何开展网络化教学的方法。

由于音乐艺术使用材料的特点,感受理解的特点,在基础音乐能力所涉及到的节奏感、准确歌唱、音乐结构分析和敏锐的听觉感受力等诸方面,它们既具有自由想象的广阔空间,也具有精确、细致、严格的特质。杨立梅的《通过多声部的节奏、

歌唱和听力练习提高学生基础音乐能力》,吸取中国民歌、儿歌为教学素材,将匈牙利柯达伊教学法融入中国本土音乐教育文化,演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柯达伊教学体系。该文也将对音乐艺术表现的精确与想象二者完美地统一于音乐教育教学中。彭传山的《〈乐理与视唱练耳〉对达尔克罗兹、奥尔夫、柯达伊三大教学体系的借鉴、融合与发展》对柯达伊、奥尔夫、达尔克罗兹三大音乐教育体系的乐理与视唱练耳教学与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体系视唱练耳教学手段和策略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国高师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对这三大音乐教学体系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进行借鉴、融合、发展、创新,探索并初步建立了中国的乐理与视唱练耳教学理论。为了能发展较为全面的音乐听觉,对现代音乐听觉的提高是视唱练耳训练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现代音乐有别于传统音乐的听觉感受,使不少人难以从音乐听觉上去把握现代音乐作品,在高校基本乐科教学中是一个需要得到更多关注的领域。兴德米特的和声理论建立在物理声学和音响学基础上,对现代音乐的和声听觉把握方面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郑曼在对兴德米特的交响曲《画家马蒂斯》第一乐章进行详细的和声听觉分析后,总结出一些提高现代音乐听觉的经验,引发了培养现代音乐听觉感的更多思索。

基于当代音乐文化与音乐课程文化的关联性成为被探索和重新认识的领域,学人们已不再将研究的目光停留在音乐技能技术研究层面,而是聚焦于音乐文化多样性与基本乐科课程理念、课程文化、课程形态、课程性质的研究,进而带动了相关的音乐课程观念、教材、教法的突破。其特点是既对当前音乐基础教育教学现状进行反思与检视,又自觉运用音乐教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阐释学、形态学、符号学、人类学等基础理论观点,充分审视、剖析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乐理与视唱练耳”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展示了基本乐科研究领域的一些新方法、新思想、新进展,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理论性,标志着我国基本乐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取得了方法上的突破,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当然,音乐教育教学研究不应只停留在理念层面上,而应落实到课堂实践中。为此,如何培养具有现代音乐教育理念的音乐能力和素养,如何形成科学的评价手段和技术,如何把手段和技术变成可操作的教学活动,如何将教学经验上升为具有中国音乐文化特征的教学思想体系,是今后乐理与视唱练耳学术研究工作的重点。而乐理与视唱练耳教学在关注音乐语言积累量的同时还应注重音乐语言的运用、音乐语言的覆盖面与选择面;教学方式应

注意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研究性学习与自主性学习相结合;教学内容应注重视唱、即唱、弹唱以及多声部等的交叉渗透。当前,中国音乐教育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基本乐科的功能、价值转变尤为突出。基本表现为,在重视学生音乐阅读量积累的同时,由重视音乐读(写)技能训练,向重视音乐文化背景信息的了解转变,或者说在培养音乐读(写)技能的同时重视音乐文化素养的形成。

综上所述,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学生音乐能力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受音乐语言阅读活动的本质、个体音乐认知发展特点的内因制约;另一方面,又由个体所处的文化、社会、生活、环境等外因决定。对音乐能力的发展特征所达成的共识,使中国当代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文化的形成初见端倪。当代中国基本乐科体系已初步形成了强调借鉴国外先进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现代科技、凸显中国音乐文化性格的当代中国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文化与教学思想,是对我国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进程中乐理与视唱练耳课堂教学设计滞后于现代音乐教育理念局面的突破。

目录

绪言

当代中国基本乐科领域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及其述评	陈雅先	1
------------------------------	-----	---

第一部分 基本乐科课程与音乐文化

近代西洋乐理在中国之传播考略	刘绵绵	3
乐理教学中的多元文化传承		
——以民族调式教学中的三个问题为例	施咏	12
简论高师基本乐理教学与音乐文化传承的关系	蔡梦	25
除了技术还有什么?		
——视唱练耳文化属性谈	孟凡玉	32
符号学视野下的视唱教学	张业茂	39
虚拟时空世界的严谨规范		
——视唱练耳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美学思考	吴海	47
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传承		
——视唱练耳改革刍议	张柏铭	53

第二部分 基本乐科教学思想与音乐教育

乐理与视唱练耳“分”“合”科问题:实质、利弊、路向	陈雅先	63
在变化中发展的高师基本乐科		
——以高师教改课程乐理与视唱练耳的教学为例	黄琼瑶	76
《乐理与视唱练耳》对三大音乐教学体系的借鉴、融合与发展	彭传山	85
现代视唱练耳课程设计方法	廖丹	95

视唱练耳教学实践中的“接受”与“应用”过程

——音乐解释学的视角阐述教学环节	叶金玫	102
高师视唱练耳研究性学习方法探究	张海敏	111
新疆高师视唱练耳在“双重乐感”理论下的教学研究	倪 波	117

第三部分 乐理与视唱练耳教学设计

螺旋上升的音乐基本概念

——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内容的整合	蔡觉民	131
通过多声部的节奏、歌唱和听力练习提高学生基础音乐能力	杨立梅	139
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整合与教学手段多样化探索		
——兼及音乐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黄 鹰	152
试谈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的整合教学	马小镭	160
从视练的实践谈乐理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刘德波	165
视唱教学中构唱能力的培养	罗 佳	171
论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同多声部音乐作品分析与写作课程的渗透教学		
.....	宋睿斐	181
关于四部和声听觉训练的一点思考	苏文婷	189
兴德米特交响曲《画家马蒂斯》第一乐章的和声听觉分析对现代和声听觉感的启示		
.....	郑 曼	195
建构现代音乐节奏训练的数理思维	肖楠楠	215
基于网络状态下的视唱练耳教学	许新华	221
多媒体系统在高师视唱练耳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刘国辉	228
后记		238

第一部分

基本乐科课程 与音乐文化

近代西洋乐理在中国之传播考略

刘绵绵

摘 要:近代西洋乐理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教堂及教会学校,主要传播者是传教士。本文对近代西洋乐理输入中国过程中的几部重要乐理著述的结构体系、主要内容作详尽的分析、归纳,并对其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加以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西洋乐理;传教士;乐法启蒙;小诗谱;喇叭吹法

西洋乐理最初输入中国主要是通过西方的传教士来进行的,根据其传播场所,可分为“宫廷”和“教堂(教会)”两个阶段。据现有史料表明,西洋乐理传入中国始于清康熙年间,由于康熙对西方文化的浓厚兴趣,不断聘请学有专长的传教士入宫任职,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亦促进了西洋乐理在清宫廷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在此期间,由于天主教在中国“准免查禁”,西方各国各地教会纷纷派传教士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于是,西方的音乐亦借助传教活动在中国得以传播。这一阶段的音乐传播与康乾时期不同的是,由宫廷转向了教堂、教会,教堂中有组织的唱诗班和乐队成为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式。赞美诗集在当时就成了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载体,中国人最初通过学唱这些赞美诗而学得了多种谱式和西洋乐理。此外,许多传教士都在中国积极创办教会学校,开设西学课程,多数教会学校都设有音乐一科,并编有教材。这一阶段涉及西洋乐理内容的著作多数是由传教士编写,其中较为突出的主要有《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小诗谱》《喇叭吹法》等。笔者试通过对这三部著作的分析,来透视近代西洋乐理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在这一阶段由传教士编写的音乐著述中,首推《圣诗谱(附乐法启蒙)》的影响与作用最大,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1864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携夫人英国新教耶稣圣会女传教士狄就烈(Julia Brown, 1837—1898)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县)创办蒙养学堂,招收男童6名,其目的是“招集天性未漓之儿童,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更复洁以恩义,以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即培养中国籍传教士。1878年,狄考文把蒙养学堂改称为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由一般小学升格为书院,分备斋、正斋两个学部,前者为三年制,后者为六年制。其中备斋课程第二年之“乐法启蒙”即乐理课,这种专为学习乐理而设置的课程,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是不多见的。该课程所用教材即是由狄就烈编著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狄就烈在登州文会馆任音乐教师期间,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读谱问题。用五线谱教学,中国学生很难掌握,而狄就烈当时也不会用简谱。狄就烈为了教会学生按谱歌唱,即用三角形、半圆形、菱形、圆形、正方形等各种符号表示音阶中的各音来进行教学,并采用首调唱名法。后来她将其编为乐理教本,即《乐法启蒙》,附在《圣诗谱》之前,既可供音乐教学用,又可供宗教教育之用。《乐法启蒙》中包括条理详解18段,系统讲授读谱法,并涉及一些有关演唱的问题。该书于1872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后,需求量不断增加,于1879、1892年再版,1907年及1913年又重印增补版,并补入四部合唱。由此可见基督教及其所属音乐教育的发展之迅速,同时亦可见《圣诗谱》在当时流传之广。

在《圣诗谱》的序言中,著者谈到著述此书的原委与目的。其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乐书以供教学之用;二是因为之前的乐书或繁琐,或已过时,或没有详细讲明音乐的理法;三是由于中国的乐法“不及西国的全,也不及西国的精”,而且中国的腔调“都属玩戏一类”,也没有中国的教友可以将中国的乐法变通得可供使用。因此“就出上工夫,开清乐法的大略,并且考究定规要紧的书目”著成此书,以便“详细讲明各理各法”,更好地“唱圣诗敬拜神”。

关于《乐法启蒙》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价值,笔者在《〈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探

源、释义与评价》^①一文中已有较为详尽的阐释,在此不再赘述。

二

这一时期由传教士编写的涉及西洋乐理内容的另一本比较重要的著作是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编写的《小诗谱》^②。

在童斐的《中乐寻源》中提及:“西人李提摩太,传教于山西省,为教会制唱歌谱,皆用中国音名(即“合、四、一、上”等名),并考中国十二律七均之法,为之图表,列于卷首,其书名曰《小诗谱》。”《小诗谱》是一部吸取了西洋音乐谱式的工尺谱体系的乐理和视唱教材,供教会学校视谱所用。今见的《小诗谱》有两种版本,一是1883年在山西太原首次刊行的木刻本,并在当地使用了数年;二是1901年由上海广学会增补出版的石印本,向全国发行。关于此书的作者问题,学界曾有争议,因首次出版的木刻本署名为“英国教师李提摩太”,但据李提摩太回忆录表明,出版这本小册子的是他的夫人玛丽·马丁(Mary Martin)。后来增补正式发行的石印本中所加的英文扉页上亦标明作者是“李提摩太夫人”(By Mrs. Timothy Richard)。据苏慧廉《李提摩太传》(1924)所述,李提摩太作为传教士,在山西时期主要忙于传教工作及政务方面,而玛丽·马丁女士作为传教士夫人,除协助他丈夫的工作之外,主要充当他们俩创办学校的专职教师及其他,因此《小诗谱》的实际作者应为李提摩太夫人。

《小诗谱》的英文书名(Tune—book in Chinese Notation)直译应为“中国记谱法的歌集”,全书以工尺谱为主要记谱形式,包括“序言”“凡例”“教法”“考法”“课”“调”等内容。其中文序云:

或有问于余曰诗谱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古圣王所以感天神而和人鬼者,莫不需此乐也。则乐之为用,安可忽而弗讲哉。

① 刘绵绵:《〈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探源、释义与评价》,载《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本节未标出处的引文皆出自《小诗谱》(上海广学会,1901年增补版)原文。